

邓小平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

陈邵桂

(湖南工业大学,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 邓小平1980年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逐步形成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终身制

[中图分类号] A849;D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4)01-0098-06

Deng Xiaoping and the Abolishment of Leading Cadres' Lifelong Tenure

CHEN Shaogui

(Hu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412007 China)

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Leadership System Reform of the Party and State* by Deng Xiaoping in 1980 put forward the abolishment of leading cadres' lifelong tenure, and it gradually formed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abolishing leadership cadres' lifelong tenure, which exerted a very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a.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the leadership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state; lifelong tenure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1]331}此后,逐步形成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影响极为深远。

一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理论

(一)邓小平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的提出

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老干部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时就提出:“我们将来要建立退休制度。”^{[1]193}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任何领导干部的任职都不能是无限期的。”^{[1]331}邓小平为什么要提出废除干部领导

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主要应基于如下两个因素:

一是鉴于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和形势任务的变化。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说:“我们一定要吸取‘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同时也一定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着现代化建设巨大任务的形势和现有大批干部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要坚决克服那种不从长远看问题的短视观点。”^{[1]326}1943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从此担任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职务直至1976年9月逝世,曾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和成就,却在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造成长达十年之久的全国性动乱。同时,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以后,党及党的

收稿日期:2013-08-28

作者简介:陈邵桂(1956-),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工业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传播研究。

领导干部由领导革命转变为领导建设,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一些干部,不完全适应,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实际”。

二是鉴于干部进退是自然规律。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级以上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说:“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1]221}人的精力是与年龄相关的,即邓小平所说的“自然规律”。1975年王洪文说过一句话引起邓小平的高度警觉和长时间的思考。他在上述报告中说:“1975年我就想到过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毛主席要我来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跑到上海去跟人说,十年后再看。当时我跟李先念同志谈过这个事情,十年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了?从年龄来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呀,在座的同志也斗不过他们。”^{[1]225}1975年,王洪文41岁,李先念66岁,邓小平71岁。就年龄而言,邓小平和李先念与王洪文比较,当时没有优势,10年后更无优势。鉴于年轻人接老一代人的班是自然规律,所以邓小平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思考领导干部的新老交替问题。可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符合自然法则的。1982年1月,78岁的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精简机构问题时说:“要我做八小时工作,我就肯定不行。”^{[1]400}1982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中央顾问委员会的过渡性时又说:“我们尊重生活和历史的辩证法。”^{[2]6}1989年9月,邓小平还说过:“自然规律是不可改变的,领导层更新也是不断的。”^{[2]316}这就是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又一重要依据:人类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

(二)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成的原因

邓小平指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形成,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一定关系,同我们党一直没有妥善的退休解职办法也有关系。”^{[1]331}我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辛亥革命虽然结束了封建帝制,但革命并不彻底。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政治上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但在思想上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影响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胡乔木在谈到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时说过:“个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残余的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

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的。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李维汉也说过:“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封建主义,包括它的思想体系、风俗习惯,在我们国家、我们党里,反映相当严重。过去由于老是打仗,来不及清算,把它带到了社会主义时代。”^[3]这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成最根本的原因。

(三)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目的

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时说过:“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周期率。”他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4]邓小平提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同样是为了跳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支配,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可持续发展。

关于国家的政治安全,邓小平是非常重视并予以反复强调的。他说:“让老人、病人挡住比较年轻、有干劲、有能力的人的路,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1]397}邓小平还指出:“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2]325}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又指出:“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都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2]240}后来的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以及2010年底以来北非几个国家发生的变局,更表明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邓小平指出:“国家不建立退休制度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气。”^{[1]288}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还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世界上许多国家恐怕都比我们解决得好。我们干部老化的情况不说十分严重,至

少有九分半严重。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2]5}这是邓小平总结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不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党和国家就没有活力,没有生气,也就没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实践

(一)邓小平带头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1989年9月,邓小平在与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2]316}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无论是资历还是在国内外的威望等,邓小平都完全可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陈云在1980年说过:“小平同志当党的主席,众望所归。”^[5]胡耀邦在1981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中央委员会主席之前,多次提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应由邓小平担任。他说:“党的主席我不能当!这个职位很重要,还是小平同志当好。”^[6]邓小平也在1988年9月会见外宾时说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2]272}邓小平不仅没有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职务,而且还与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等一起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下来。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83年6月,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虽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职务,并从国务院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仍然身兼数职。因此,怎样从现任职位上退下来,是他当时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中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见到邓小平时,发现耄耋之年的邓小平正在为国家新老领导人的有序交替做准备。基辛格问邓小平:“我不知道应该用哪个头衔称呼您?”邓小平回答说:“我现在头上有太多帽子,我想把它们给别人,我想尽量少干。”^[7]

1987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邓小平不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务,只留任党和国家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89年11月9日,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1990年3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从此,邓小平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特别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做了表率。

(二)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思想法制化

1979年11月,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认真选好接班人,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在三几年内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十年后不晓得会出什么事。要忧国、忧民、忧党啊!要看到这是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1]222}怎样才能选好接班人,邓小平提出:“从改革制度着手。”^{[1]348}也就是说领导干部的进退要有制度规定。

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三十七条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是由领导机关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干部,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

1982年11月26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任期做了说明,特别强调了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他说:“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就取消了实际上存在的领导职务的终身制。”^[8]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第六十六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委员长、副委员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七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第八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总理、副

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从此,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成为党的规章和国家的法律,并对党和国家领导层面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进行了具体的法律制度规定。这就是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特别强调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因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333} 2006年8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县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职务”;“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到15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此自上而下被全面废除。

(三)邓小平为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采取的过渡措施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中说:“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名称还可以再考虑),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明确规定各自的任务和权限。这样,就可以让一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班子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1]339}由此可见,邓小平在思考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时候,就在思考如何安排好从领导岗位退出的老同志的工作,并充分发挥老同志作用的问题。后来,邓小平还指出:“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这个过渡是必要的,我们选择了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切合我们党的实际。但是在这个过渡阶段,必须认真使干部队伍年轻化,为退休制度的建立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创造条件。”^{[1]414}如前所述,198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并选举产生中央顾问委员会,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会上当选主任。邓小平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我们就讲要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缺乏活力。现在着手来解决,采取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合乎我们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应

当说,这一次在解决新老交替问题上迈出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花两个五年的时间,通过这种过渡的形式,稳妥地顺当地解决好这个问题,把退休制度逐步建立起来,那就是很大的胜利。这对于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是办了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可以设想,再经过十年,最多不要超过十五年,取消这个顾问委员会。”^{[1]5-6}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按照邓小平关于“顾问委员会是个过渡”的思想和当时的实际,中央顾问委员会历经10年顺利完成时代赋予的任务,为党和国家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邓小平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深远影响

(一)实现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平稳交接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报告以后,1981年3月,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受到邓小平表扬。邓小平在1981年7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上说:“我建议大家向他学习。他亲自出来讲话,推荐一位比较年轻的同志当部长。”^{[1]384}由此表明,邓小平关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思想,很快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理解和接受,此后,干部领导职务特别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退出,逐步制度化、规范化,且为全党、全社会广泛接受,形成共识。

2002年11月,江泽民及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从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等职位退出,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权力的顺利交接、集体交接。2003年3月,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鹏、江泽民、朱镕基分别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职位退下来,顺利实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新老交替,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退出机制的形成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做出了重大贡献,奠定了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基础。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再一次实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政治局常委领导集体顺利交接;2013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实现新老交替,从而标志着党和国家领导职务退出已经规范化、制度化。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认为:“过去30多年间,中国实现了从个人魅力型领袖治理到集体领导模式的转变。事实上,制度化机制已经在中共各级领导层交接过程中使用,对权力加以限制。”^[9]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特别是实现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顺利平稳交接,深得人心,广受好评。

例如,党和国家原领导人田纪云2003年退出领导岗位以后,在《退休后别对现任领导指指点点》一文中说:“任期满了,或者年龄到了就退下来,天经地义,不胜光荣。现在人才辈出,不愁后继乏人。”^[10]

再如,知名国情专家胡鞍钢在《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一文中,高度评价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形成的集体交接机制。他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就在于有一个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他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称为“集体总统制”,并充分肯定:“在实现充分信息分享的信息结构与充分民主决策的决策结构相互作用方面,远比‘个人总统制’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和决策优势,更具民主性、协调性和高效性。”胡鞍钢认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实际运行体现在五大机制:集体交班、接班机制;集体分工协作机制;集体学习机制;集体调研机制;集体决策机制。”^[11]

又如,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谢勇在《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文化自信》一文中说:“国家最高权力平稳移交的制度机制建设。中国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建立起了各级领导人的任期制,不像从前、也不像前苏联以及现在中东一些国家,领导人一干就是几十年,生命到了终点,任职才到终点。邓小平同志提出建立领导人正常退休制度,这些年来经过长期实践已经成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准则。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政治改革成果,都是在波澜不惊的情况下平稳实现的。”^[12]

以上说明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不仅已经制度化,而且无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地方领导干部,还是专家学者都形成了共识并衷心拥护。这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重大成果,为国家长治久安奠定了人事制度基础和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经受了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考验

邓小平在1989年6月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只要它是团结的,努力工作的,能够成为榜样的,就是在艰苦创业反对腐败方面成为榜样的,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2]310}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这一论断完全是科学预见。不久以后的苏联解体则从反面证明,不解决好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国家就没有长治久安。高放将苏联解体的原因归纳为:“个人集权、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并由此造成的“三个缺失,即缺失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和法制”。^[13]其中最为核心的还是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的问题。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什么能经受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严峻考验,最重要的就是逐步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而“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

就国内形势的变化而言,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30多年来,没有因国内形势变化而影响社会稳定。200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1135美元。^{[14]17}根据国际上的历史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社会矛盾多发期,处理得当可能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处理不当可能出现社会动荡。正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15]到2011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432美元,^{[14]17}在这个十年中,我国社会总体平稳,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从而表明已经顺利渡过矛盾多发期。尽管国家在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过程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保持了总体上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

就国际形势的变化而言,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世界两极格局的瓦解,呈现“一超”(美国)“多强”(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等)的局面,目前,正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上,先后有苏联以及东欧、西亚、北非等地一些国家出现政权更迭等社会动荡严重的局面。在经济上,先后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特别是后者几乎波及整个世界金融市场。30多年来,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政治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经济

全球化向纵深发展,国际局势虽变幻莫测,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受了考验。

(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稳步增长。2001 年,我国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 6 位,^[16] 2006 年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17]¹⁸ 2010 年第 2 季度,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 年,我国若干重要经济指标已居世界各国之首,外汇储备世界第一,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一大钢铁生产国,最大汽车产销国,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18] 回想当年,邓小平在 1979 年 12 月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们的对外贸易总额还不如台湾多。”^[1]²³⁸ 仅仅 20 几年,到 2006 年成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17]¹⁹ 到 2011 年,连续 3 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14]²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关于 198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披露:1982 年社会总产值为 9 894 亿元。^[19]《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 519 322 亿元。^[20] 仅仅 30 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了数番。“30 多年改革开放……城镇化率由不足 20% 到超过 50%……7 亿农民结束了 2 600 年种田交税的历史。”^[21] 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建设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无论纵向还是横向比较,都堪称奇迹,并且经受了 2008 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正如胡鞍钢在《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一文中所说:“在世界同一个大考,即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主要宏观经济指标是最佳的,而且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总量的相对差距迅速缩小,由危机前的 4 倍缩小至 2011 年的 2.2 倍,此外中国对全球应对金融危机的积极作用最大,实际贡献最显著。”^[11]

综上所述,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思想,特别是“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从理论到实践,对当代中国的发展影响深远。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 散木. 党史中勇于修正错误的中共领导人[J]. 领导文萃,2011(12,上半月):80-83.
- [4] 金冲及. 毛泽东传(1893-1949)[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719-720.
- [5] 金冲及. 陈云传:下[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473.
- [6] 满妹. 胡耀邦十次坚辞中共中央主席始末[J]. 文萃月刊,2013(9):45-46.
- [7] 汪嘉波. 基辛格讲述四十载对华故事[J]. 新湘评论,2012(4):57-58.
- [8] 彭真.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N]. 人民日报,1982-12-06(6).
- [9] 颜昊,等. 中共权力交接日益制度化进一步走向成熟[N]. 人民日报,2012-11-16(4).
- [10] 田纪云. 退休后别对现任领导指指点点[J]. 领导文萃,2010(10,上半月):83-85.
- [11] 胡鞍钢. 辉煌十年,中国成功之道在哪里[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7-03(1).
- [12] 谢勇. 坚持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文化自信[J]. 新湘评论,2012(11):33-35.
- [13] 胡应南. 以苏联解体和苏共败亡为鉴[J]. 清风,2013(4):41-42.
- [14]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5]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1.
- [16]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74.
- [17]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8] 任仲平. 转变,中国道路的历史性跨越——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上)[N]. 人民日报,2012-11-6(1).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关于 198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N]. 人民日报,1983-04-30(2).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人民日报,2013-02-23(5).
- [21] 任仲平. 转变,现代化历程的关键性突破——从十六大到十八大(下)[N]. 人民日报,2012-11-07(1).

责任编辑:骆晓会